

完整生动地突显中国人的性格，帮助你拓展视野、认识自己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中国人的性格

李亦园 杨国枢 主编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中国人的性格

李亦园 杨国枢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性格 / 李亦园, 杨国枢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11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ISBN 7-5343-7073-6

I. 中...

II. ①李... ②杨...

III. 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研究

IV. 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827 号

本书原出版者为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原书名为《中国人的性格》, 经授权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中国人的性格

主 编 李亦园 杨国枢

责任编辑 许敏敏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页 2

字 数 311 0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简体版序言

《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于1972年在台北问世，出版者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盛行两种研究取向，一是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观点，二是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的观点。前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重点是个人或团体在社会及其他情境中所表现的行为与行为结果。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及心理学三者最具代表性。科际整合则是强调：在研究任何社会与行为现象时，应尽量同时采用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并在探讨过程中加以统整或综合。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界所采用的这两种观点，当时的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心向往之。

经过慎重考虑后，我们决定以中国人的性格作为探讨的主题，以行为或心理(内隐行为)的分析作为探讨的重点，以不同学科的合作作为探讨的策略，从事一次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前所未有的尝试。《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便是这一尝试的成果。书内各章的十二位作者中，有社会学者与心理学者各三位、人类学者与精神医学者各两位，史学者与哲学者各一位。十二位学者分从不同学科的观点，就中国人在其特殊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或脉络中所表现的行为与行为结果，分析中国人性格的形成、特征、历程及变迁。也就是说，采取行为科学的观点，经由科际合作的方式，本书体现了一种研究中国人性

格的新方向与新策略。

因事属创举,本书在三十年前出版后,引起台湾地区人文学界、社会科学界及一般知识界的注意,在海内外流布颇广。初版系当局出版,推广不易,乃于1987年委由民间的桂冠图书公司改版发行,以应读者的需要。自桂冠新版本印行以来,转眼又是二十年,如自初版算起,已经是三十多年了。作为本书的主编,多年来我们一直有个愿望——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现在,这个愿望即将实现,江苏教育出版社决定印行简体版,让此书正式与大陆读者见面,以达到以书中之文会大陆之友的目的。该社促进两岸学术交流的美意,令人钦佩。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社方及负责编校工作的先生女士,敬致无上谢忱。

李亦园

杨国枢

2006年2月20日

序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再版序

《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是多年前举行的一系列科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关于那一系列科际研讨会的意义与经过，在初版的序言中已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中国人的性格》是在1972年初版，出版者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书中内容主要是从行为科学的观点探讨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这在当时尚属创举，因而引起学术界与知识界的注意，阅读或参考者颇众，三年之内即连印三次（三版）。可能因为此书流布较广，且是从行为科学的观点讨论中国文化问题，遂引起少数有特殊背景之学者的疑忌，乃在泛政治主义的笼罩下，运用其特殊的影响力，促使此书在三年之后即不再发行。此后读者对此书的需要持续存在，香港与台湾竟先后出现盗印本数种，长期半公开发售。盗印本大都印刷粗劣，有的甚且将字体与版本缩小，颇不利于阅读。但十几年来，盗印本的流行对此书的推广倒是有不可否认的功劳。

自此书初版以来，已经是十五年了。最近的十五年中，台湾在各方面的进步最为快速。时至今日，在大幅开放化的趋势下，泛政治主义的阴霾已逐渐消弱，学术与文化等方面的禁忌也大为减少，甚至大陆作者的著作也可在台湾出版。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中国人的性格》的重新出版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为了便于推广与流传，这次我们特别委请民间的机构出版与发

行。在台湾的社会及行为科学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性格》有其纪念性的特殊意义,因此再版出书的内容仍然保持初版的原貌,而仅作微小的文字修正。自1972年此书出版以来,台湾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对中国人之性格与行为的研究日益加强,现在我们对中国人之思想观念与态度心理的了解已大有进展,但此书中的各篇论文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日后有关研究的理解尤为有用。在编排印刷方面,新版的《中国人的性格》比原版更为精美,这当然也代表一种进步。

作为本书的编者,有一点是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那就是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十五年间各文的作者都能健壮如恒,而且在学术上皆有更高的进境,缔造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当初参加研讨的最年长的杨懋春教授,仍是康乐如昔,不断著述,为我等后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原书的各位作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合作,以及同意在桂冠图书公司重新出版此书。在今后的漫长学术旅程中,希望彼此能继续不断的互相鼓励与帮助,以创造更丰富的学术生涯。

李亦园 杨国枢

1987年9月24日序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序 言

这一本集子是一年多以来我们举行一连串讨论会的成果。最初我们决定举行这个讨论会有两个目的，就是想借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人聚在一起讨论一个共同有兴趣的题目的机会，促进社会科学科际综合研究或科际合作的趋势；同时又想借一个和谐、愉快而又免去“碍于情面”的学术讨论会，促成一种虚心接受客观批评与建议的风气。至于是否能把讨论的成果印成专册，倒还在其次。经过十多次的讨论聚会后，参加的同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就是认为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内达到上述的目的，这是同人感到很快慰的；何况，现在我们又能把讨论的成果出版为专集，公之于同好，这更是同人感到十分高兴的。

发起这个讨论会的是杨国枢兄和我两个人。国枢兄与我有长久的合作经验，特别是在研究文化与人格这方面，我们有相近的兴趣，所以我们选定了我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作为讨论会的主题。我们认为虽然国民性的研究在目前已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时那样成为热烈讨论的题目，但在基本文化与人格理论上仍有其重要性，而且这是一个最适宜于做行为科学或社会科学科际综合研究的题目。何况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性格也很少有真正作学术性探讨的机会，在这个交通发达、不同文化接触频繁的时代，对自己能多作了解，才能在接触别人的情境下认清自己，而不至于迷失方

向,这也是很重要的。从过去研究的经验,我们觉得要有效地研究国民性或民族性,应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医学以及史学与哲学各科不同的方法与观点来作综合性的讨论,所以我们邀请了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再加上国枢兄和我,一共十二人组成了这个讨论会的同人。下面依学科的不同先介绍各同人的背景:

杨国枢 “国立”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心理学)。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心理学)。

李美枝 “国立”台湾大学心理系兼任讲师(心理学)。

文崇一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

李亦园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人类学)。

杨懋春 “国立”台湾大学农业推广系教授(社会学)。

吴聪贤 “国立”台湾大学农业推广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社会学)。

朱岑楼 “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社会学)。

徐静 耕莘医院精神神经科医师(精神医学)。

曾文星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讲师(精神医学)。

韦政通 私立醒吾专科学校教授(史学)。

项退结 私立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

讨论会共分为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是商定在“中国国民性”的主题下各子题的大纲与内容,这一阶段的讨论开始于1970年4月间,每隔一个月举行一次,每次讨论两个子题,加上第一次准备会议,共举行了七次聚会。第二阶段的讨论会是等待论文已撰成初稿,并事先油印分发同人后,再逐篇进行批评讨论,所以进行这一阶段的第一次讨论时已是次年(1971年)的4月中旬了。这一阶段的讨论共举行了六次;自1971年4月15日至6月12日,每隔两周举行一次,共举行五次,讨论了十一篇论文,其中杨懋春先生因有美国之行,所以他的论文延至7月下旬单独提出讨论。此外,1971年7月4日,全体

同人又曾在郊区一俱乐部举行了一次综合性讨论,检讨全部讨论过程。第一阶段的讨论与第二阶段的讨论另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前者仅有参加讨论会的同人与会,后者则扩大邀请若干对讨论主题有兴趣的学者及研究生参加,并接受他们的批评与意见,每次与会者约在二十人左右。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为了达成本讨论会的基本目的,所以对批评建议的意见都作慎重的处理。在第一阶段讨论中,每位作者不但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作为修改大纲以及撰写初稿的参考,有的甚至依据讨论的结果把题目都改变了。第二阶段的讨论虽在论文初稿撰写完成之后,但我们把全部讨论都录音并整理出来,送给每位作者参考,作者重新把一些他个人可以同意的意见,或容纳在论文中,或据之作适当的修改。凡是作者不能完全同意的意见,以及一般性的批评注释,也都保留下来附之于文末,所以在本集子中,每一篇论文之后,都附有页数不等的“讨论”部分。全部“讨论”部分的页数共有八十页,占全书页数近五分之一,这可说是本书的一项特色。

在最后一次综合讨论会中,我们曾对全部讨论会成果出版成书后的书名作长久的讨论,最初拟采用“中国国民性研究”一名,但是学人类学的认为应采用“民族性”一词以代替“国民性”,因为“民族”一词含有文化的意义,而“国民”一词似较偏于政治的含义,可是心理学家则较赞成用“国民性”一词。虽然最后大家同意采用“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一题为全书的总题以为折中的办法,而各篇论文的内容则随作者的意愿分别用“国民性”或“民族性”,但由此可见各个不同学科的人对研究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基本问题仍存有不同的看法,同时也由于这一现象我们放弃了在各篇论文之前冠以一篇综论“国民性”或“民族性”研究导言的计划,而让各篇论文各自说明其看法,而不企求在形式上的划一,我想这应该是各种不同学科作初次综合讨论时常会出现的现象。

关于本书内容编排与讨论时各篇论文提出的次序不同,我们决定把四篇研究传统中国人性格问题的放在最前面,接着是三篇以文

化产物(cultural products)为分析对象的著作,再次是四篇以调查或测验方法研究当代中国人性格及其变迁的报告,最后则以一篇综述性论文作为结束。每一篇论文的本文部分都由作者分别执笔撰写,但讨论部分则由编辑助理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所以在文体上两部分颇有差异,特别是讨论部分,为了保存讨论时的气氛,所以文字尽量口语化,并插有英文词汇,这是应该请读者原谅的。

作为编者之一,我要感谢所有参加讨论会的同人,假如不是大家共同的信心与忍耐,这个冗长的讨论会恐无法圆满达成。我也要感谢在第二阶段讨论中提供宝贵意见的学者和同学们。再者,黄顺二、庄英章、陈茂泰、田静逸、陈祥水及何传坤诸君协助整理录音记录,何国隆协助印刷事务,均一并致谢。

李亦园

1971年11月27日写于南港“中央研究院”

目 录

简体版序言	(1)
再版序	(3)
序 言	(5)
韦政通:传统中国理想人格的分析	(1)
文崇一:从价值取向谈中国国民性	(40)
朱岑楼: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 论中国人性格的耻感取向	(72)
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	(106)
李亦园:从若干仪式行为看中国国民性的一面	(146)
徐 静:从儿童故事看中国人的亲子关系	(167)
曾文星:从人格发展看中国人性格	(189)
杨国枢:台湾大学生的人生观	(215)
李美枝、杨国枢:台湾大学生的价值观	(263)
吴聪贤: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性格之蜕变	(279)
瞿海源、杨国枢:台湾大学生现代化程度 与心理需要的关系	(318)
项退结:中国国民性研究及若干方法问题	(343)
附 录:有关中国国民性研究书目汇编	(369)
名词索引	(392)

传统中国理想人格的分析

韦政通

本文的目的，在透过经、子等古籍中有关道统人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记载，研究古人对理想人格的构想，并进而探讨它与中国国民性之间的关系。

“传统中国”一般的界说，多与清末以来的“现代中国”相对而言。传统中国绵延的历史相当久，学者们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可予以分期，本文似无此必要。盖本文探讨理想人格所采用的资料，虽以先秦经、子为主，但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所产生的影响，却贯串着由汉至清的整个历史，这种影响力要到现代中国之初才逐渐消退。

“理想人格”为本文研讨的主题，它的含义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探究的**代表人格**（representative personality）有些相似。布鲁姆（L. Broom）把各家对代表人格的解释归纳为三种：

I. “代表”可能指统计上的次数。行为中任何一个项目，出现于社会内大多数人民，即是该社会“代表人格”的一部分。

II. “代表”所指者，也许是人格中的某些共同特质，不因**外显行为**（overt behavior）之差异而丧失其存在。因此其注意重点不在可观察的行为和反应的小节细目之上，而在于基本**取向**（orientation）以及**人生观**（outlook）。

Ⅲ.“代表人格”有时候是指能表现文化精神或精华的人格。如此说来,则代表人格仅能为少数人所共有。此种人格最容易与主要社会制度相整合^①。

上列三点,其中第三种解释,正是本文所研讨的思想人格的主要含义。理想人格是先秦诸子将古帝尧、舜等理想化的产物,而先秦诸子又是秦、汉以前中国文化的主要创建者,他们在世之日,很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巧妙地经由理想化的过程,使他们的理想在古史中生了根。从此,本来真相难明的上古帝王,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精华人格的代表。

一、古帝理想化与理想人格的构想

W. Barrett 说:“古典学者中的人文传统把古人理想化了,同时虚构了事实,这是一切理想主义观点无可避免的。”^②他的话是以欧洲的传统为背景说的,衡之于中国传统,也正可以为他的话提一佐证。先秦诸子理想化的古人,是上古史里的帝王,这些帝王经由理想的过程,遂成为中国古史的黄金时代,这也就是中国道统的来源。

古帝理想化的过程:道统雏形的形成

唐、宋以来的道统观念,盖始于韩愈,韩愈作《原道》,始将道的观念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统绪结合起来,并宣称这些古帝互相传授者即是此道。宋、明儒者发扬了道统的观念,并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所谓八字心传,界说了尧、舜所传之道的含义。自是道统的权威才告树立。唐、宋儒者们所以特别重视道统观念,消极的作用是因为要凭借它与佛、老相抗,积极的目的是想借以取得儒家正统

^① 布鲁姆等著,朱岑楼译,109~110页,1967。

^② 白瑞德著,彭镜禧译,190页,1969。

的地位。

唐、宋儒者提倡的道统观念，并非凭空虚构，如果不是先秦诸子早已把上古帝王做了有系统的理想化，唐、宋的道统权威是不可能建立的。

在先秦诸子中，参与古帝理想化工作的，儒家以孔、孟为主，此外还有墨子。儒家的荀子主张“法后王”，以粲然明备的周道为其文化理想的根据，认为五帝之政已因“文久而灭”，遂持怀疑态度^①。《老子》一书，完全未涉及古帝之名。《庄子》虽偶然也有赞美尧的话，如《天地》篇说“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勤，不罪而民畏”，但其他各篇，多次提到古帝时，往往有极严酷的批评，如《盗跖》篇不但称“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且有“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等语。韩非一方面承继了法家革新旧文化的传统，一方面又更强化了其师荀卿怀疑古史的态度，因此坚决反对期古，认为“贤尧、舜、汤、武”，乃“天下之乱术”^②，使他成为先秦诸子最著名的复古论者^③。至于为什么孔、孟、墨子要把古帝理想化，此问题值得研讨，且待下文第五节再予讨论，这里得先把古帝理想化的过程展示出来。

根据《论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把古帝理想化的情形有以下几点：

A. 《论语》提到古帝的有《泰伯》、《宪问》、《卫灵公》、《述而》、《子罕》五篇共九次。

B. 《论语》提到的古帝有尧、舜、禹、稷、文王、周公。

C. 孔子虽把古帝理想化，但属散见，还看不出有统绪的系络^④。

D. 孔子理想化古帝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很空泛的话，如说：“大

① 《荀子·非相》。

② 《韩非子·忠孝》。

③ 参看罗根泽，90~101页，1970。

④ 《论语·尧曰》，尧、舜、禹已连成一条系络，近人顾颉刚（见《古史辨》第四册顾序）、钱穆（见《论语新解》，677~678页）等皆疑此篇非出于孔子，今从之，不以作为道统的论据。

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说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说禹、稷：“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说文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根据这些话，只能使人了解到孔子对古帝崇敬思慕之情，还不容易使人相信就是古代的历史。

根据 A、B、C、D 四点陈述，可知在先秦诸子中，孔子虽是最早开始把古帝理想化的人，但对道统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料。可是到孟子，情形就大不同了。

A.《孟子》七篇，每篇都提到古帝，共三十三处。

B. 和《论语》古帝数目相比，《孟子》加进了商汤和武王，于是从尧、舜到周公、孔子，顺着朝代的次序，很自然就出现了一条纵贯的系络。在《孟子》里，有意把古帝连成一条系络的有三次。

第一次见于《离娄下》，孟子分论诸帝的德性和为人，他们的顺序是：禹→汤→文王→武王→周公。

第二次见于《滕文公下》，孟子提出一治一乱的历史观，所有的古帝都代表历史上的治世。他们的顺序是：尧→禹→周公→孔子。

第三次见于《尽心下》，在这一节里，孟子从古史中提出证据，以证明他“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顺序是：尧→舜→禹→汤→文王→孔子。

C.《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三代学校的名称虽然不同，所学的内容却是一样的，它就是“明人伦”。孟子认为明人伦即足以“王者师”，为新兴的王者立法，在这里，道统的观念已呼之欲出。

基于上述三点，古帝理想化的情形到孟子手中，不但把古帝的名称顺着朝代的次序，连成一条系络，且以人伦的观念，把三代做了实质上的连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到孟子道统的雏形已告形成。

墨子的年代在孔、孟之间。据《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废财而病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虽反对孔子宗周的文化思想，却接受了孔子把古帝理想化的启示，和孟子一样，都充分运用此一方式，宣扬自己的学说。

根据《墨子》一书有关古帝的记载，可使我们知道下列几点：

A. 书中提到古帝之名和事迹的有《所染》、《七患》、《三辩》、《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下》、《节用中》、《节葬下》、《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非命上》、《非命下》、《贵义》、《公孟》、《鲁问》诸篇，共五十五处。

B. 提到的古帝有尧、舜、禹、汤、文、武，而不提周公。

C. 书中把尧、舜、禹、汤、文、武连成一条系络的地方共有十一处之多，而以尚贤、节葬、兼爱等为古帝所明之“道”。

将墨子和孟子做一比较，可知：（一）墨子似比孟子更能善用托古的技巧弘扬自己的大道；（二）他们是各自受了孔子的影响，由古帝个别的理想化，渐渐形成了一个统绪，并看不出孟子曾受墨子的影响。

理想人格的构想及其特质

当在1923年，钱玄同就已怀疑尧、舜不是历史人物，他说：“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①我们认为不仅是尧、舜，就是禹、汤、文、武、周公，也统是儒、墨两家有目的地构想出来的伟大人格。由于儒、墨的影响，在古籍里不论是经、子，都可以找到这些构想，现在就根据古籍的记载，把古人对理想人格的构想以及它的特质表列如下：

^① 顾颉刚编著（第一册），67页，1970。